

# 赤水河畔，一位国民党区长为何营救上百名红军伤病员？

本报记者王丽、李惊亚

赤水河畔淋滩村，隶属贵州遵义习水县隆兴镇，毗邻四川省古蔺县。86年前，淋滩村作为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渡口，曾经数次迎来红军。战斗过后，不少负伤流落的红军，在这里惨遭杀害。一片黑暗中，当地一位国民党区长却冒死保护上百名受伤红军，鲜为人知，扣人心弦。

## 散落红军伤员受到“特殊保护”

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红军路过习水，与国民党军在土城镇附近展开了一场激战——青杠坡战役，战斗异常惨烈。之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四渡赤水，又经历数次大小激战。

红军四渡赤水，两次选择土城镇附近的淋滩村作为主要渡口。当地人认为，一是这里冬季水位下落，河边现出一个大沙滩，河床窄，最窄处不到五米，搭浮桥最容易；二是与淋滩当时在赤水河边的地位有关。新中国成立前，从赤水县城到遵义的(水陆两路)大道一直由淋滩经过。那时，来往商旅络绎不绝，码头经常停靠着二三十条大船。街上商铺林立，热闹非凡，白天人声鼎沸，晚上灯火彻夜通明。红军把这里作为主要渡口，要船有船，要人有人，供需给养能够保障。

就这样，淋滩在伟大的长征中，留下了光辉的名字。

然而，四渡赤水，许多红军伤病员也流落在川黔边境。这些流散的红军伤病员不时惨遭反动军队、地方反动武装杀害，一些红军伤病员躲进淋滩村附近的大山。

面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地毯式搜查，在川黔交界一带大量伤病员藏在异乡的山头上，在凄风苦雨的寒夜中忍着疼痛和饥饿等待天明，但也知道天明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不曾想到，当地一名国民党区长，向困境中的红军伸出援手。

听闻许多流散红军的遭遇，时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刘纯武以治安为由，布告辖区内各地，严禁杀害红军，警告杀人偿命，并着手收留流落在淋滩附近的红军伤病员。对此，刘纯武之子刘富林回忆：“找到红军伤病员后，父亲将他们接到家中安置，伤病员们的食宿、医疗费用等全部由父亲承担。”

淋滩是赤水县第七区的区公所所在地，就这样，远近的红军伤病员陆续来到淋滩，他们有的老百姓送过来的，有的是自己来的，甚至有四川古蔺地下党托人送来的，到1935年秋末已达六十多人之多。

刘富林说，来的时候，不少人饥寒交迫，伤



4月21日，宋加通的儿子宋光平在擦拭家门前的“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石碑。

病缠身。这些都集中安排在刘纯武家老房子里，刘纯武专门请家中行医的亲戚为这些红军战士治病医伤。刘纯武自己也懂一些医术，有时来的人多了，就帮着治病。

据《习水政协文史资料》记载，红军伤病员伤好后，对愿返回原籍的，刘纯武每人资助一块银圆当作路费，临走前都好好招待一顿饭。留下来的，刘纯武帮助安置，做工经商务农就业。至1936年初，刘纯武送返原籍的红军约六七千人。

一直在淋滩村生活的老红军宋加通就是被刘纯武救下的红军战士之一，宋加通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受伤后，被秘密藏在当地村民家中养伤。据宋加通生前口述回忆：“我原在隆兴区再启才家养伤，伤好后就在他家劳动，得点吃的。后来听说淋滩区公所喊我们去集中，当时不知是祸是福……区公所区长刘纯武叫我和李进士给他种田，我们就在刘家住下来。”

1935年10月，时任赤水县县长的陈延炯巡视到淋滩，对刘纯武收留红军伤病员，给予医治遣返等事表示肯定，叮嘱须严防任何人从中加害。习水县党史研究会副主任袁锐说，陈延炯也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曾积极支持开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

## 从红军身上看到真理和光明的方向

据习水县政协2015年编印的《隆兴文史》记载，1935年至1936年初，先后来到淋滩医

伤治病的红军达100多人。在贫穷的山沟里，竟然成功救治了百余名红军伤病员，这在漫漫长征路上算得上是罕见了。然而，刘纯武身为国民党的区长，为什么要冒险救助那么多红军伤病员？他的思想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刘富林说，父亲在贵阳读书之前，曾在四川綦江读书。刘纯武在外求学期间，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的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军阀混战等。在川黔边区，在他身边，土匪猖獗杀人放火，占据县城达数月之久，这些现实深深刺激着这个年轻人。

那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子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面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祖国，努力寻求救国图强之路。许多热血青年选择远赴西方求学，刘纯武本已准备留法勤工俭学，但由于家中突发变故，才不得已回家。

一个有思想和抱负的年轻人，在命运的安排下，回到了贵州的山乡。那么，他的“与众不同”就不难理解了。

刘纯武的父亲刘春和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家贫做纤夫，后养蚕起家，成为地方上的大富，曾担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据习水、赤水两县的县志记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纯武返乡后曾动用自家巨资修学堂、办新学、办女子学校。当时整个赤水县只有两三所女子学校，其中就包括淋滩这个穷山沟的一所，足见其思想的先进。此后，刘



土城渡口纪念碑(无人机照片)。 本报记者欧东衢摄

纯武又协助其父改建川黔大道，在淋滩大力发展工商业，曾办过丝绸厂、织布袜厂、炼铁厂、铸钢厂等实业。刘纯武从返家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致力于这些事业。

袁锐说，看得出来，刘纯武这几十年来来的作为，都有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等新思潮的影子。进一步说，刘纯武对共产党、对红军主权的看法跟他读书时接受的新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据刘纯武长子刘富苍讲，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对他讲，共产党就是“劳农主义”。后来刘富苍在大学期间进图书馆，看到《新青年》的文章时，发现了这个词。刘富苍介绍，父亲1952年去世，终年58岁。

袁锐认为，刘纯武早年研读过这些著作，青年时期接受的新思想都深深烙在他的思想中。当红军来到他的家乡，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的军风军纪，成为他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所有这一切使他豁然明白，也许他早年所要寻求的中国出路就在这里。由于这些原因，他对红军才会认同、才会同情，才会冒那样大的政治风险，才会拿出自己的家资，供红军伤病员吃住、医治治病，才会出现令今人“惊奇”的“一个国民党的区长去救护百余名红军”的事实。

## 红军地下党支部“星火燎原”

四渡赤水因中因留在古蔺的红军战士刘湘辉，用《留在古蔺养伤的时候》一文回忆了

他写《有粮有猪有竹子，缺钱缺肉缺筷子》《收取五花八门费，苦了卖猪佬粮人》《信息隔山外，毛竹烂山里》；他写《富裕农民有远见，请教师，办学堂，瓮安教育经费缺，少桌凳、多危房》《采访落水，更知群众过河难，计划造桥，寒暑易未易落实》。

每天，刘开富的日程被安排得极满。凌晨3点多在乡邮电所用明码电报发完稿，睡了几个小时，7点多又上路了。中午饭在沿途老乡家解决，是绝佳的采访时机。下午继续徒步到日落，平均日行35公里。

晚饭依旧是采访，到了夜深人静的11点，他才开始写稿，“因为笔头慢，经常要耗到凌晨2点才写好。”

1985年2月3日，刘开富行至赤水河采访，在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贵州习水县土城醒觉村几位老人把刘开富拦下。见他听不懂当地话，一位叫赖成龙的老人，蹲在路边，在刘开富的本子上写下一段话，意为：50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过赤水有浮桥。50年过去了，现在什么桥也没有了，老百姓要过河，年年淹死人，盼望早日修一座长红桥。

刘开富了解到，每年夏秋，赤水河暴涨，百姓过河相当危险，当地群众建桥呼声很高。然而有干部却含糊回答：“情况复杂，原因很多。”

气愤中，刘开富写下《架浮桥，神兵一夜过赤水；盼铁桥，土城群众呼声高》一文。中央领导看到新闻报道后非常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结果显示，赤水河架桥资金被挪用情况属实。很快问题得到解决，长红桥建成了。刘开富说，后来，红军四渡赤水的九个渡口均已架桥。

1985年元旦，刘开富在乌江南岸水落坝村采访周世昌老人。对话中了解到，当年就是周世昌和一位名叫庾子清(已故)的人一起，帮助红军从江中捞起沉船，架起浮桥过江的。

同样，周世昌老人代表百姓请求刘开富向上反映，“盼望渡口早日建桥”。

当晚，刘开富以“本报贵州瓮安专电”发出了《乌江千古流，人犹记，红军破敌处；渡口四不开，需架桥，群众翘首待》。

1985年10月19日，刘开富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顺利回到北京。先后接到萧克、杨成武、张爱萍、王震、秦基伟等老红军的

自己与刘纯武打交道的一段经历。

一天，刘湘辉路过淋滩区政府，看到门前贴着条消息说：我敌后游击队大战平型关，重创日本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我就跑去问那个区长(刘纯武)，游击队是什么人?他说‘就是朱总司令的队伍，现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就问他我写信到前方去行吗?区长问我给什么人写信，我说是给彭副总司令写，他笑着拍着桌子说‘你快写吧，我保证把信邮到敌后，给彭副总司令’。”

两三个月后，刘湘辉收到中央的回信，说信收到了，希望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在当地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力所能及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嘱咐多与重庆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怡同志联系。此后不久，刘湘辉离开了古蔺，重返革命队伍。

宋加通则在淋滩村娶妻生子，落地生根。1938年，他和其他几名留在淋滩的战友与四川党支部取得联系，恢复和接上组织关系，并在淋滩村成立了红军地下党支部，受中共地下党古蔺县委领导。古蔺县委指示，要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听候召唤，配合对敌斗争需要，开展工作。

宋加通担任第二任支部书记，开展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淋滩地下党支部党员在受伤中掉队，但思想没有掉队，仍决心要救民于水火。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赤水解放，但大军过后，新生政权尚未巩固，土匪猖獗，宋加通加入了保卫新生政权的清匪反霸工作。

20世纪50年代，宋加通回到阔别已久的江西宁都老家，特意精挑细选了儿家家乡的蜜柚苗带回淋滩村，带着农民们一起试种，如今亩产值已达1万多元，被群众称为“红军柚”。当年救治过红军的淋滩红糖走俏市场，村里不仅建了三四家红糖厂，还创建了淋滩红糖、赤特香红糖等多个品牌，产品远销海内外。

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2018年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旧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满了“红军柚”。“今天的淋滩村党支部，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期间建立地下党支部的延续，至今已有了12任支部书记。”淋滩村党总支书记赵启伟介绍。

“红军像一炬星火，照亮了这片土地。进步人士刘纯武舍命救红军的故事，说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的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契合了人民的心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袁锐说。

邀约，去汇报采访见闻。一天，受邀去歌鸺家里的罗开富，还没落座，歌鸺就急切地问：“找你就想听听那两个人的情况。”

原来，报道中提及的“那两个人”，令当年参与乌江战役的老红军寝食难安。

歌鸺说：“当年，周世昌、庾子清帮我们4团从乌江里捞沉船、砍竹子、找门板、架浮桥，忙了好几天。”

再后来，又先后以不同方式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回京给歌鸺汇报“乌江大桥建好了”，歌鸺高兴地回应：“你们记者就应该沉下去，多走、多看、多想、多写，向红军学习，不怕吃苦，要有牺牲精神。”

采访中，罗开富给他讲述了他退休后第一次“坐牢”完成的长征路。他说那一次开始时，他们是7个人三台车，等走到第20天时，另外的四个人两台车，选择了放弃。几个年轻人跟他们分手时，说道，“一开始，我完全不相信长征会如此艰难，但这20天里，我真的感受到了。”

也是那一次重走长征路，罗开富带着7万块钱一路散尽。他给曾经帮助过他的向导，也给救助过他的医生。缕缕青烟中，他说，“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在第一次重走长征路中，罗开富算过，一路上，先后大约有2800多名向导、陪同，400多名医护人员帮他完成了这次“壮举”。

“我一个人的长征就有这么多人在帮我，回想当年的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不就是靠着革命理想信念和百姓的帮助取得胜利吗？一路走来，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渺小、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罗开富说：“记者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要反映民意。党记者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的诗句是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理由，“也是走完后来深信不疑的座右铭”。

“选择亲身体验式采访，就是要用汗水体会汗水，用寒冷体会寒冷，用饥饿体会饥饿，用病痛体会病痛，用意志体会意志，用激情体会激情，然后把我这个当代人的感受告知当代人，用亲身经历让大家更真切地认识长征，感悟长征精神。”罗开富说，“二万五千里所凝聚的红军长征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寄托着全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

# 中共七大赋

袁志敏、孙五郎

风拂禹甸，雷震中原。春回陕北，雨霁延安。解放区聚精英一会，杨家岭集代表八团。“同心同德”，条幅高挂；“坚持真理”，警句标悬。国际歌之声，映现人心虔诚；开幕词之语，论评国运两般。告“谦虚谨慎”之警诫，发“戒骄戒躁”之谏言。毛泽东思想，绣征程之旗帜；七大会精神，开革命之新篇。

若夫雅尔塔咖啡未冷，法西斯日迫西山。全国抗战，渐转反攻之势；日伪途穷，濒临覆灭之渊。定民族之命运，标发展之罗盘。远虑深谋，瞄未来而拳画；审时度势，怀宏略而高瞻。尔乃毛主席高屋建瓴，发政治之宏论；朱老总以战论兵，综军事而雄谈。刘少奇析缕分条，解党章之新义；周恩来崇论闳议，析统战以精言。夫总结经验，研判前辙。澄明疑惑，放下重荷。奋斗目标确立，担当历史重任：“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两条路线，显晦分明；两个前途，据理评说。诠释人民战争，擎宗旨之华章；阐明中共地位，树雄中之勃勃。三大作风，铸就优良传统；一篇《决议》，推出行动准则。维护核心，上下共向；拥戴领袖，鼎鼎调和。至若抗战总结，代表每开茅塞；军事任务，将军警晓机谋。赖人民之根本，施韬略而掉镗。六万字党章，举思想之纲领；七十条款列，为党建而铸模。五个阶段，详述统战之历史；三个问题，剖析行动之核。兹则统一思想，是非明辨；拨云见日，大道恢卓。步征程而发轫，吟解放之序歌。

嗟夫，七大精神，千秋珍贵。闭幕雄词，振聋发聩。荡“下定决心”之豪言，留“愚公移山”之启海。“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今百年华诞，重温警粹。推特色以创新，遇困难而不畏。同心戮力，开拓进征；砥砺前行，披坚执锐。崇高使命，欣大党以担当；美好未来，为人民而描绘！

《中国共产党百年大事赋》编辑委员会供稿



(上接13版)

## “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假令每张《经济日报》拥有五名读者，那么，就应该有将近一千万人熟悉罗开富这个名字。从去年的10月17日起，人们差不多每天都在一版下半部‘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里读到他的文章。”

那是1985年，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上，有记者回忆陪同罗开富同行一段的经历：“越来越多的读者把目光投向这里，从中看到一幕幕历史，一幅幅现状，听到了喜悦的倾诉和急切的呼吁。”

“一路上，罗开富穿着当地老红军战士赠送的草鞋，与众人告别，而另一边几位同志已欢呼着迎上来。”

“罗开富说：‘这就是人民对红军的感情。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的确，从于都出发，第一天下来，罗开富的脚上磨起了血泡；第二天更重；第三天，写完稿子，发现脚上的血泡和袜子粘连在一起，脱不下来，剪掉袜子，碎片依然粘在血肉上。

天亮前，于都祁禄山村村民肖锡美找来医生给他的伤口消毒，在脚上包了3只大口罩，老乡们送来连夜赶编的大草鞋。鼓励声中，罗开富继续上路。

在贵州黎平高洋寨雪山冰凌路段，行走了65天的罗开富，连人带铁皮照相机摔下悬崖，左腿骨折。是侗族老人用铁钎帮他拔出刺进骨节的相机碎片，擦了药酒，包上草药。

有人劝他停留几天治伤，也有人建议骑马前行，罗开富拒绝了。见他坚持，有人特意赶制了铁拐杖。这根陪他走完长征路的铁拐杖，最后硬是生生磨短了几厘米。

在瑞金时，罗开富采访顾玉平，这位曾给周恩来总理牵过马的老红军对他说，“你真要走长征路?那就要学习红军，不要怕死，要坚强，要相信沿途党组织，要紧靠群众。没有这几条，红军能走到吴起镇?你能走通我们当年走的路吗?”

当年红军长征所走的原路，多是迂回在山间背向，少人经过的险径。50年后再走，罗开富依然能体会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下的一路艰辛。

一路上，罗开富数次遇险，当地老百姓和向导无数次把他救起。

在赤水河上游的贵云川交界处，罗开富被卷进了冰雪汇成的洪流，是四川的李永祥、贵州的刘中宝等奋力把他救上岸；在夹金山，罗开富掉进雪坑，是解放军杜宝玉把他拉了出来；在打鼓雪山，罗开富从半山腰滚落，是严木学等八位藏族百姓把他接住；在日干乔过草地，同行的十人全部陷进沼泽，是受惊的牦牛靠上岸时，藏族小伙子丹舟抓住了牛尾巴，顺势被拖上岸，随即向泥潭抛下绳子，挣扎数小时后，剩下九人才得以脱险；在荒无人烟的老山界，他们一天粒米未进，饥饿中把随身携带的药片、止咳冲剂分食一空，甚至吞下仅剩的黄连素……

1985年5月29日，经历八个月的行走抵达泸定时，罗开富已经不成“人样”，1米76的个头瘦成了“稻草人”。50年前曾指挥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军等在泸定，随行的还有安岗。

握着罗开富的手，杨成武问安岗：“你还让他走啊?”

安岗说：“他说，‘让我再试试，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

看着安岗，杨成武说了两个字，“万一……”

回忆过往，沉默中，罗开富把目光移向了窗外。

安岗回答：“已经安排了接替的记者。”

杨成武的目光再次落到了罗开富的身上，罗开富说：“重走长征路是我的选择，如果有记者要接替我，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

随后，同行的医护人员帮罗开富检查了身体。输液、处理外伤……罗开富说，第二天，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他感觉自己好了很多，“走下去，不成问题。”

说话间，罗开富再次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跺了跺脚，腿骨感觉又顺畅起来。我们猜想他那经过长途征程的双腿如今肯定出了毛病，问他，只是摆摆手说，“又是一个好人了。”

的确，如他这样的硬汉，怎能认输?

## “党报记者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

一路上，罗开富走得很艰难，拖着疲乏之身采访，沿途百姓的真实生活都流淌在他饱含激情的文稿中，有欢欣，更有忧虑。